

这些政策为何沦为“万分正确、十分无用”?

《半月谈》梁建强 周楠

各地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是把党中央有关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推动地方发展、增进群众获得感的重要一环。

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制定政策时常出现“不接地气”的情况,导致“不易操作”“不合时宜”的政策频频出现:有的政策“短命”,有的盲目“画饼”,有的完全沦为“空文”……这些“万分正确、十分无用”的政策是如何产生的?

“短命政策”等频现

为了减少空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中部某省曾下发通知,以“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要求各地,甚至包括乡镇、农村在春节期间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不过,出台仅仅3天之后,这一政策就被叫停。原因很简单,城市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已经逐渐形成共识,能够执行。但在农村、乡镇地区,节日燃放烟花爆竹量大面广,强制“一刀切”,短期内很难得到群众认同,也很难执行。在群众的强烈反对声中,这一政策最终不再推行。

“短命政策”背后,折射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决策的不够慎重与科学。近年来,命运相似的政策还有不少。

记者调研中了解到,南方某市城管部门曾推出一项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细则中明确,对有效抓拍到车窗抛物行为的群众,每例可予以100元奖励。初衷虽好,但很快这一新规就遭遇了群众关于执行中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的质疑。

因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细则》中关于“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撒物品”的规定,具体的执法部门应该是公安交警部门,并非城管部门。最终,城管部门选择取消了车窗抛物有奖举报活动。

速成式政策成“应景之作”

为何这些现象频现?广西行政学院教授凌经球以部分地方的扶贫政策文件制定为例介绍说,文件起草往往由扶贫开发指挥部产业指导组的工作人员负责,但具体起草的同志忙于事务无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个人的经验和智力水平也无法将中央的文件精神把握到位,其结果只能参考其他省份的一些做法,赶鸭子上架写出初稿。

“有专家提了意见,让他们先去广泛调研,广泛深入了解基层的需求。该同志表示应该这样,但领导要求文件要尽快出台。”凌经球说,初稿出来后,一般由产业指导组的相关部门“会审”——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形成一个初步的政策文件,发到各相关职能部门,由其提出进一步修改建议。



这往往是各部门利益博弈的过程,各部门会提出对自身有利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按程序对文件进行会签,由相关领导签发。“最终,文件中不少措施只能是大而化之,提出的模式在各地汇报材料中都存在,所谓的注意事项放之四海皆准,实乃‘万分正确、十分无用’。”

记者采访中发现,还有一些地方在制定政策时热衷做“二传手”,把制定政策搞成了“表态”。

大别山区一名在基层工作了10多年的镇党委书记告诉记者,当地接到很多来自县、市的文件,都是“戴个帽子就发下来了,没有结合实际进行任何增补”。具体的操作中,中央或者省里出台了文件,市里就下发“关于转发某某政策要求的通知”,县

一级则是进一步转发。

“到了乡镇甚至村一级,我们不是不想落实,而是有的政策没有配套支撑,没有具体协调指导,想执行也没有办法,只能是不了了之。”这名镇党委书记说。

须“问计于基层 求教于实践”

“政策不接地气、朝令夕改,最终伤害的是政府部门的形象与公信力。”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岳奎认为,制定政策时,必须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做好充分的调研工作,广泛听取民意,把“政府意愿”和“群众需要”更好地统一起来。

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陈文胜认为,一些不懂农业农村农民的人制定三农政策,习惯于用工业发展的经验来指导农业的发展,用城市发展的经验来指导农村的发展。由于不懂基层,缺乏长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积累,多是“走马观花”式调研,想当然地作出判断。“很多政策未作深入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热点听汇报、看典型,匆匆忙忙起草和出台文件。”

陈文胜认为,政策制定必须“问计于基层,求教于实践”。因为解决基层现实问题,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群众满意不满意、认可不认可,更不能凭想当然。

岳奎认为,地方政府部门只有科学制定各种政策,才能真正管用,才能更好地回应民众利益诉求、破解各类发展难题。“政策制定,必须以制定过程的科学性、具体内容的合理性、可执行性为前提。反之,不接地的政策,最终只会是一纸空文。”

高价报班说停就停、商家“挟娃”逼消费…… 你为娃娃过这些冤枉钱吗?

新华社 胡洁菲 龚雯

报个游泳课、上个编程班、来趟亲子游……暑期里“娃经济”红红火火,不少家长选择通过亲子消费来和孩子增进情感、为孩子“充电”“打气”。

记者调查发现,热闹的“娃经济”背后藏有不少“暗坑”:一批亲子游泳班、早教班收完钱后“人去班空”;一些培训机构运营资质“不清不楚”、不少商品或服务“货不对板”……已有不少家长不慎掉入“坑”中,维权不易,叫苦不迭。

“我的权益说没就没!”

知名早教品牌“家盒子”“黄”了!这让家住北京西单的肖女士十分不解,“我的权益为何说没就没?”

“已考虑到有机构‘跑路’的危险,千挑万选才找了这家规模大、经营久的品牌,没想到还是‘中招’了。”肖女士称,去年7月份她在“家盒子”西直门店充值了约2万元的消费卡,包括游泳和早教课,但孩子的课才上了半年,今年2月份西直门店就以动力系统故障为由,停止了营业。

很快肖女士发现,该机构北京4家分店中的另外2家也相继关闭,会员权利被严重侵害。

无独有偶。吴女士在上海早教机构“凯瑞宝贝”浦东大拇指广场店给孩子报了价值6万多元的各类课程并预交了大部分费用。然而,到了今年7月,该店突然通知停业。吴女士还有价值2万元左右的课程至今无法退款。

一些亲子旅游产品则存在严重的服务“蒸发”情况。来自天津的孙先生告诉记者,今年2月他在大众点评上购买了一张

亲子畅玩卡,商家宣传称可以在几十家知名合作景点享受优惠,使用期限为3年。不料到现在实际可用的景点只剩两家,且都在偏远郊区。为此,孙先生多次拨打客服电话维权,但大众点评方面都以该卡已消费过为由,拒绝退款。

还有三类“暗坑” 让消费“步步惊心”

除权益可能说没就没之外,“娃经济”中还有三类“暗坑”,容易让家长中招。

——“多多益善”预付费。上海市民周女士准备给孩子报一个亲子游泳班,但培训机构表示每节350元的课程,必须52节起卖,且要求必须一年半以内全部用完。她告诉记者,当前市场中多是这类一次性打包缴费的课程,让人感觉很无奈。“一次性缴款费用不小,且万一有事去不了,那么贵的学费很可能就打水漂了。”

——“不清不楚”缺资质。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培训机构对教师资质的认定十分含糊,缺乏统一权威的认定考核标准。另外,在涉及诸如体育训练等明确要求机构或教员应取得相关资质资格的特



定专业领域中,机构或教员往往都无法提供相应的运营资质或职业资格证书。近日,上海市卫健委公布了对沪436家人工游泳场所的抽查情况,其中有包含亲子培训业务的场馆就因存在类似问题而被定为不合格。

——“挟‘娃’自重”逼消费。家住杭州的常女士告诉记者,因一家摄影机构宣传称可免费为新生儿拍摄5张照片,她决定同意其拍摄自己的宝宝。可实际拍摄时,该机构擅自为宝宝拍摄了100多张照片,并强行向其推销高价套餐。常女士表示,该机构一面称不买套餐就不会还给她孩子的底片,一面以“这点钱都舍不得为孩子花算什么父母”等话语冷嘲热讽,“最后我没办法,花了2000多块钱了事。”

亲子消费“填坑”为何难?

业内人士称,亲子消费已成为继零售

和餐饮之后,购物中心吸客力最强的一类业态。但记者发现,仅去年至今,相关纠纷投诉、判例就有数千条之多。多名专家告诉记者,当前“娃经济”里“坑多多”,消费者安全感不强,消费信心受到影响。

法律依据不足,司法保护弱是亲子消费领域“填坑难”的原因之一。据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介绍,对于商家“跑路”、服务“蒸发”类问题,当前相关法律大多设立的是事后监管,“成本太高,效果也成问题。”

而在规范预付缴费问题方面,陈音江指出,商务部曾颁布《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但并不适用于教育机构。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又只针对“面向中小学生学习、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的学科类校外线上培训活动”,规范亲子消费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法律依据。

一些地方市场监管机构也存在重视不够、保护不足的问题。因“家盒子”突然关店遭受损失的消费者宋女士对记者反映,她曾尝试拨打12345政府便民热线反映相关情况,问题反馈到某区市场监管机构后,就再也没有进展。而因凯瑞宝贝关店而遭受损失的家长中,不少人通过拨打12345、110报案等方式进行维权,也都至今未能收到明确回复。

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史随心等专家认为,应通过完善法律依据、建立制度机制等方式,为“娃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分分析师姚建芳建议,市场监管机构应提升动态监管效率,维护市场公平安全的环境。